



试论朱彝尊词学理论的成就及意义

孙克强

摘要:朱彝尊是浙西词派的领袖,也是一个卓有建树的词学家。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词学新见:学习南宋风格,以姜(夔)、张(炎)为宗,倡导雅正规范,构筑了系统的词学批评理论,奠定了浙西派的词学理论基础。朱彝尊的词论批评具有反拨明代词学观念的性质,有极强的针对性。从朱彝尊及浙西词派之后,清代词学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始并强化自己的特质,终于成就了所谓“清词中兴”的宏业。

关键词:朱彝尊;清代;词学;浙西词派

“明代中衰,清代中兴”是词学家们的共识。其实,清初 30 余年尚沿袭明代的余风,清词真正别开生面是从朱彝尊及浙西词派开始的。康熙十七年(1678)汪森将朱彝尊主编的《词综》增订付梓。翌年,龚翔麟汇编的《浙西六家词》刊刻于金陵,打出浙西派的旗帜。并将当时已失传数百年的张炎《山中白云词》八卷附刻于书后,以明浙派词学渊源。从此,浙西词派登上词坛,并逐渐居于词坛主流。为了改变明代以来词风的浮靡衰颓,朱彝尊提出了以南宋为依归,以姜(夔)、张(炎)为宗,倡导雅正规范的一系列词学主张,奠定了浙西派的词学理论基础。朱彝尊及浙西词派创作和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词坛面貌为之一新,由此开创了清词的新局面。

—

南北宋词因时代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风貌,后世词家根据自己不同审美取向往往于南北宋有所取舍,由此形成了南北宋之争。贯穿有清一代,或标榜北宋,或倡导南宋,一直是词坛上争论最激烈的话题。然而,在朱彝尊之前的词坛基本上一直是崇尚北宋的风气,由明至清初,词学家对晚唐、五代、北宋词多有偏爱,而对南宋词要么置而不论,要么加以排斥。云间派偏取南唐、北宋,无视南宋,有“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弊”^①的提法。朱彝尊竖起浙西词派的旗帜,首先从推尊南宋开始。在朱彝尊等人的努力之下,南宋词的价值逐渐为人所认识,倡南宋之论亦为人所接受。陈廷焯说:“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分虎(李符)、符曾(李良年)佐之,而风气一变。”^②倡南宋之论遂成为浙西词派标志性的主张,以致浙西派被称为“南宋派”,清初词风也因学习南宋词而产生了重大转变。

朱彝尊多次谈到南北宋词的不同特点以及取法的门径。《水村琴趣序》说:“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③《鱼庄词序》说:“曩予与同里李十九武曾

①《词苑丛谈》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第 76 页。

②《白雨斋词话》卷三,载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3825 页。

③《水村琴趣序》,载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论词于京师之南泉僧舍,谓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①《书东田词卷后》说:“窃谓南唐北宋惟小令为工,若慢词至南宋始极其变。”^②我们注意到朱彝尊提到南宋总是与慢词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彝尊倡导南宋实是对慢词此一词体形式的推扬。

从唐宋词的发展历史来看,唐五代北宋初年是小令的一统天下,从柳永到周邦彦慢词逐渐成熟,并且逐渐成为宋代词人创作的主要形式。南宋时期慢词更为盛行,已成为词坛的主流形式,南宋卓有成就的大词人无不是以慢词长调著称。慢词具有与小令不同的审美特性,这种特性在南宋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南宋慢词的时代文体特征。朱彝尊推崇南宋词正是从此处着眼的。

小令和慢词(长调)本为词因音乐的节奏、调式而形成的不同样式。唐宋时期曲子分为“急曲子”、“慢曲子”,慢词即依慢曲子所作之词^③。小令与慢词因音节的急缓、语言的多少而有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清初词家已经注意到小令、长调不同的审美特色。彭孙遹《金粟词话》说:“长调之难于短调者,难于语气贯串,不冗不复,徘徊宛转,自然成文。”慢词在叙事抒情、结构安排和语言修辞等方面都与小令显出了审美差异。慢词有信息容量大、层次变化多和抒情宜于跌宕起伏的特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表现内容方面,小令、慢词各有不同特点:“词贵柔情曼声,第宜于小令。若长调而亦喁喁细语,失之约矣,惟沉雄悲壮,情致亹亹方为合作。”^④“词家狃于本色当行之说,多以柔情曼语,标新竞异。然宜于小令,而不宜于长调,宜于闺情春思,而不宜于登临、感遇、咏物、怀人诸作。”^⑤朱彝尊提倡南宋的慢词,不仅在于对时代、体裁的选择,实为表现特殊的思想情感而对词的题材、风格的选择。

朱彝尊推尊南宋词除了风格审美因素之外,也有个人思想情感的因素。康熙十一年(1672),朱彝尊编成了他的词集《江湖载酒集》。《江湖载酒》语出杜牧《遣怀》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朱彝尊以此冠名自己的词集,取“落魄”之意。《江湖载酒集》中有一首〔解佩令〕《自题词集》表达了身世之感与词学取向的关系:“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词中特意提出要师“玉田”,偏取南宋张炎主要因为有身世情感的认同因素,即“涕泪飘尽”、“落拓江湖”之后的选择。南宋末年的舒岳祥《赠玉田序》对张炎词风有一则评论:“宋南渡勋王之裔子玉田张君,自社稷变置,凌烟废堕,落魄纵饮,……笑语歌哭,骚姿雅骨,不以夷险变迁也。其楚狂与?其阮籍与?其贾生与?其苏门啸者与?”指出张炎身历家国之痛的情感变化。正是身世经历的落魄坎坷,使朱彝尊选择了南宋张炎凄清词风。朱彝尊对南宋词人的认识更多是着眼于深沉、复杂的思想情感,推尊南宋,亦是结合自己命运遭际的选择。

朱彝尊的主张得到了曹溶、曹贞吉、魏坤、陈维崧、李良年等人的支持^⑥,加之汪森等人的大力鼓吹,浙籍词人纷纷响应,很快便风靡大江南北。不少词人改变了以往尊崇北宋的习尚,而转向学习南宋。陈对鸥曾描述当时的情形:“自《浙西六家词》出,瓣香南宋,另开生面,于是四方承学之士,从风附响,知所指归。”^⑦朱彝尊之后,浙派词风经厉鹗、王昶、吴锡麒、郭麐的大力提倡,在康、雍、乾、嘉、道五朝长盛不衰,宗法南宋的主张一直被奉为圭臬。如浙西六家之一的李符(分虎)的前后变化颇有代表性。李符原为“善学北宋者”,后来在朱彝尊等人的影响之下,“益精研于南宋诸名家。”^⑧人们不仅开始重视学习南宋词,而且还常以南宋词风作为评价当代词人的标准,以与南宋词风相似、相近为当代词人的优长。这与清初常以唐五代、北宋为标准的词学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说明推崇南宋已形成风气,词学风尚已发生变化。宗南宋成为浙西词派的突出标志,浙派词人无不把推尊南宋作为词学宗旨。从康熙时期的朱彝尊、到乾隆年间的厉鹗,再到嘉道时期的戈载,都是将标举南宋作为主要词学主张,凌廷堪说:“词

①《鱼计庄词序》,《曝书亭集》卷四十。

②《书东田词卷后》,《曝书亭集》卷五十三。

③参见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3章第2节,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④《梅墩词话》,载《词话丛编》,第837页。

⑤《词苑萃编》卷八引何嘉延语,载《词话丛编》,第1949页。

⑥见《静惕堂词序》、《词苑萃编》、《水村琴趣序》、《书东田词卷后》、《鱼计庄词序》。

⑦《词苑萃编》卷八,载《词话丛编》,第1951页。

⑧《词苑萃编》卷八引朱彝尊语,载《词话丛编》,第1945页。

以南宋为极,能继之者竹垞。至厉樊榭则更极其工,后来居上。”^①以戈载为代表的“后吴中七子”亦以偏好南宋而闻名,蒋兆兰《词说》:“戈顺卿《宋七家词选》标举词家准的,详于南宋者,以词至南宋始极其精也。”由此可见在浙西派主盟之时,词坛推尊南宋词的盛况。

学习南宋的主张不仅扩大了词人们学习唐宋词的视野,同时也实现词坛风气的转变。朱彝尊及浙西词派提倡学习以姜、张为主要内涵的南宋词风,落实在词风的雅化、诗性方面,较之明代以来婉丽、俚俗的风气有了质的变化,清词开始具有了自己的特质。

二

对南宋词人姜夔的推尊是朱彝尊词论的又一重要内容。白石词于南宋末及元代初中期备受推崇,但却在明代冷落下来^②,明代词家很少提到姜夔。清初词坛盛行南唐北宋之风,南宋的姜夔及姜派词人自然不受重视。朱彝尊将以南宋为宗与推尊姜夔、张炎,倡导清空、骚雅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完善了理论形态,产生了较大影响。朱彝尊推尊姜、张并非简单地树立个别典范人物,而是构筑一个具有新的审美风格形态的词学流派,即在传统婉丽、豪放两派之外的第三派,新词派的确立对浙西词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朱彝尊阐述了姜夔词的意义。朱彝尊反复强调:“姜尧章氏最为杰出”,“填词最雅,无过石帚”^③,”词莫善于姜夔”^④,”姜夔审音尤精”^⑤。朱彝尊对姜夔的推崇既是对南宋中后期雅词思潮的继承,又是对明代以来词坛尚俗风气的反拨。

朱彝尊推尊姜夔是因为白石词在词学史上具有特别的作用和意义。白石初登词坛的南宋乾道、淳熙时期,词坛“方尚甜熟”^⑥、“俗学充斥”^⑦。如年龄稍长于姜夔的蔡戡谈及当时的词风云:“靡丽之词,狎邪之语,适足劝淫,不可以训。”^⑧姜夔同时代的赵师秀称吕渭老词:“婉媚深窈,视美成、耆卿伯仲耳。”在北宋中期即被斥为淫靡俚俗的柳词此时又被引作表扬参照的标准,词坛风气和词学旨趣可以想见。在词坛的另一端,辛弃疾的追摹者亦颇有声势,所谓“豪气词”“至刘改之诸公极矣”^⑨,亦形成风气。正如王炎所概括的:“今之为长短句者,字字言闺阁事,故语懦而意卑;或者欲为豪壮语以矫之。”^⑩无论是溺于淫靡,还是故逞豪壮,其弊端都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这种词学风尚的背景下,白石词的清雅才会显得风格独具而受到推崇。正如后世汪森所云“宣和君臣,转相矜尚。曲调愈多,流派因之亦别。短长互见,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⑪白石词的出现,有矫正词坛弊端的作用。

历史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明末清初词坛风气竟与南宋乾、淳年间颇为相似,亦是香弱和豪宕两种词风盛行。明末人毛晋谈及当日词坛的现状云:“近来填词家辄效颦柳屯田,作闺帏秽蝶之语,无论笔墨劝淫,应堕犁舌地狱,于纸窗、竹屋间,令人掩鼻而过,不惭惶无地邪!若彼白眼骂坐,臧否人物,自詫辛稼轩后身者,譬如雷大使舞。”^⑫到了清初,词风沿明末并无大的改观。一是“鬻弄俚词,闺檐冶习”^⑬的淫靡词风依旧;二是康熙初一些人模仿阳羡词人陈维崧的豪宕风格,沦于粗豪。正如尤侗所指出的“予惟

①郭 麐:《灵芬馆词话》卷一,载《词话丛编》,第1508页。

②明代白石词不被推重,原因约有二端:其一,白石词集全本于明代未现于世。毛晋《六十名家词》本《白石词》仅录34首,而清初人所能见到的《白石乐府》仅存20余首。朱彝尊《词综·发凡》:“《白石乐府》五卷今仅存二十余阙也。”《黑蝶斋诗余序》:“《白石词》凡五卷,世已无传,传者惟《中兴绝妙词选》所录,仅数十首耳。”其二,在明代词坛影响最大的词选本《草堂诗余》中未选白石词,这更使明人对姜夔词的认识受到影响。参阅孙克强:《白石词在词学史上的影响和意义》,载《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2期。

③《词综·发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④《黑蝶斋诗余序》,《曝书亭集》卷四十。

⑤《群雅集序》,《曝书亭集》卷四十。

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竹屋痴语》。

⑦陈撰《自跋白石词刊本》。

⑧《芦川居士词序》,载《定斋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王世贞《艺苑厄言》,载《词话丛编》,第391页。

⑩《双溪诗余自序》,载《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

⑪《词综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⑫《花间集跋》,汲古阁《词苑英华》本。

⑬陈维崧:《词选序》,载叶嘉莹:《迦陵文集》卷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近日词家,烘写闺幃,易流狎昵;蹈扬湖海动涉叫器。二者交病。”^①针对清初词坛的现状,浙西派词人在批评两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词学理想:“豪旷不冒苏、辛,秣褻不落周、柳”^②,在这种词学思想的指导下,白石词的清雅就成为浙西派的必然选择,以白石词为代表的清雅又一次成为救偏补弊的针砭。

朱彝尊之后,推尊姜夔即成为浙西词派的标志性主张之一,习词者莫不将姜夔词作为典范。词坛几于“家祝姜、张”^③,习词者将白石视为词家之最高典范已为共识。如吴蔚光云:“文极于左,诗极于杜,词极于姜。”^④邓廷桢云:“词家之有白石,犹书家之有逸少,诗家之有浣花”。^⑤宋翔凤云:“词家之有姜白石,犹诗家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⑥享誉之高为其他唐宋词人所远不可及。

其次,朱彝尊揭示了以姜夔为宗主的“第三派”的意义。词从《花间》开始,就以婉丽为“本色当行”,苏轼之词新天下耳目,成为豪放词开山。以后周、柳之婉约与苏、辛之豪放就成为词的两种主要风格,习词者往往规步于这两条道路。姜夔词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不仅具有独特的风格,而且于婉丽缠绵和痛快淋漓之外另立清空骚雅一宗,成为所谓“第三派”。姜夔在生前已有追摹者,身后向风慕义者更是一时蜂起,后世称为“姜派”,南宋末年即有“近时作词者,只说周美成、姜尧章等”^⑦的风气,张炎等词人更是“仰板姜尧章”^⑧,形成了南宋后期一个影响甚巨的重要词派。

朱彝尊注意到姜夔词在南宋所产生的影响,从风格流派的角度对宗姜的词人群体进行了勾画:

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⑨

与以往的词论家出于个人对某家的偏爱不同,朱彝尊推尊姜夔是把他作为一个流派的宗主,所附之南宋词人则因有意学姜而具有其部分风格的特色。朱彝尊建立了以姜夔为首的姜派词人体系,成为浙派的理论重心之一,当时及后世的浙西派词家无不称举此体系。如汪森云:

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箭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⑩

又如杜诏云:

姜夔尧章最为杰出,宗之者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吴文英、蒋捷、周密、陈允平诸名家,皆具夔之一体,而张炎叔夏庶几全体具矣。^⑪

建立以姜夔为首的南宋清雅词派体系,对浙西词派的确立和壮大有着重要的意义:姜派的存在说明崇尚清雅的词学主张早在南宋已蔚为风气,浙西词派的理论主张自然渊源有自;宗尚姜夔早在南宋已成词学流派,意味着浙西词派与之一脉相承,是南宋姜派的继承和发展。

朱彝尊推举姜、张,为词学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之前词家只知词风有二派:周、秦的婉约绵丽和苏、辛的豪放粗犷。自朱氏首倡,厉鹗、王昶等人踵事增华,姜、张的清雅之风逐渐为人所认识。从此,以姜夔、张炎为代表的第三派为治词者所普遍接受。在浙派影响之下的词家,莫不津津乐道于此派。王鸣盛云:

北宋词人原只有艳冶、豪荡两派。自姜夔、张炎、周密、王沂孙方开清空一派,五百年来,以此为正宗。^⑫

对清雅词派所谓“正宗”地位的强调,起到了宣传这一新为人们所认识的词派的作用。

①《曹顾庵南溪词序》,载尤侗:《西堂杂俎集二集》卷二。

②曹 溶:《古今词话序》,载《词话丛编》,第729页。

③彭兆荪:《小谿觞馆诗余序》,载陈乃乾:《清名家词》,上海书店1982年。

④《自怡轩词选序》。

⑤《双砚斋词话》,载《词话丛编》,第2530页。

⑥《乐府余论》,载《词话丛编》,第2503页。

⑦陈 模:《怀古录》,中华书局1993年。

⑧郑思肖:《玉田词题辞》,见《山中白云词》。

⑨《黑蝶斋诗余序》,载《曝书亭集》卷四十。

⑩《词综序》。

⑪《山中白云词序》,《山中白云词》城书室本。

⑫《蟾壑山人词集》评语,《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四引,载《词话丛编》,第3549页。

浙派的词家视姜张的清雅为正宗,在创作上也以之作为典范。在浙派居于词坛主流位置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的一百余年间,清雅词风一直是词家追求的审美理想境界。

三

朱彝尊倡南宋、推姜张的目的在于为词学的发展确立思想艺术的标准,这种标准一言以蔽之即“雅”。以“雅”论词,宋代已不乏其例,南宋尤具声势。南宋初年曾慥的《乐府雅词》、鲋阳居士题序的《复雅歌词》,以及南宋末年张炎《词源》、沈义父的《乐府指迷》皆明确提出从思想、音律、语言等方面雅的要求。朱彝尊的雅词论实为南宋的继续。

朱彝尊推崇姜、张一派,尤其心仪姜夔,是因为姜词最能体现“雅”的特点。《词综·发凡》说:“填词最雅,无过石帚。”汪森《词综序》也说:“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以雅论姜夔,南宋末已有之,张炎《词源》云:“白石词……不惟清空,而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还认为“白石骚雅句法”可以救正周邦彦词的“意趣不远。”张炎所标举的雅正内涵丰富,涉及思想内容,语言风格,音韵格律等各种因素。张炎认为词“皆出于雅正”,“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雅正之词,必须内容无邪、语言典雅、意趣高远,以之来衡量词人词作,柳永、康与之词“为风月所使”,“失其雅正之音”;辛弃疾、刘过“作豪气,非雅词也”。而姜夔词“能特立新意,删削靡曼之词”,不仅内容无邪、语言典雅,并且格调高雅不俗,“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读之令人神观飞越”,远远高出流俗之上。以张炎来看,姜夔词是最符合雅词的标准。概括起来,张炎论姜词之雅包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曰雅正,二曰高雅。朱彝尊以姜、张为依归,强调清雅,也主要是这两方面的内容。

“雅”作为文学范畴的第一个内涵是雅正。雅正作为思想规范和审美标准源于儒家思想。在词学领域,雅正的内涵大约有二个方面:

第一,创作思想端正。即儒家传统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①，“思无邪”。感情的抒发要平和节制,不能激切太过。词长于言情,委婉、绮丽是其特色,但要之在于把握言情之“度”,不可流于淫艳、褻荡,不能“为情所役”,“为风月所使”。掌握适度即“雅”,超过限度则“俗”。朱彝尊曾多次强调“秣而不靡,直而不理,婉曲而不晦”^②，“绮靡矣,而不戾乎情;镂琢矣,而不伤夫气”^③。《词综·发凡》还告诫人们:

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法秀道人语涪翁曰:“作艳词当堕犁舌地狱”。正指涪翁一等体制而言耳。

北宋黄庭坚的词有一些极鄙俗的作品,淫艳无度,为人称为“山谷恶道”^④。故当时有个大和尚法秀就当面劝他少作此类“荡天下淫心”的艳语,以免日后会堕“犁舌之狱”^⑤。朱彝尊以黄庭坚为例告诉人们要引以为戒。《群雅集序》也说:“昔贤论词,必出于雅正,是故曾慥录《雅词》,鲋阳居士辑《复雅》也。”曾慥、鲋阳居士皆为两宋之际的词学家,曾慥选编有《乐府雅词》,其自序说明宗旨:“涉谐谑则去之,名曰《乐府雅词》”,以雅作为选择的标准。鲋阳居士以古雅乐为宗,批评“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褻不可闻之语”的弊病,提倡复雅。二人之说是词学史上最早又最鲜明的以雅正思想要求词体的理论,对后世词学影响深远。朱彝尊特意提出曾慥、鲋阳居士的理论,有接续雅词传统的意图。此后思想的雅正就成为浙派一个重要的词学原则。如浙派后期的吴锡麒论词以雅正为立论主旨。《戴竹友银藤花馆词序》云:“大抵倚声之道,雅正为准。质实者,连蹇而滞音,浮华者,奇蹇而丧志。”强调雅正为作词的准则,反对有悖于雅正的各种偏颇倾向。

第二,音律合乎规范。张炎论词十分重视音律的规范,其雅正说包含有音律的要求,《词源》开篇即说“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强调“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词之作必须合律”。

①《论语·八佾》。

②《蒋京少梧月词序》,载《曝书亭集》卷四十。

③《孟彦林词序》,载《曝书亭集》卷四十。

④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载《词话丛编》,第1648页。

⑤《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

在《词源》之后附有张炎曾闻其音律学说的杨守斋的《作词五要》：“第三要填词按谱”，“第四要随律押韵”。皆是对音律方面的要求。朱彝尊继承了张炎的主张，《群雅集序》云：

宋之初，太宗洞晓声律，制大小曲，及因旧曲造新声。……徽宗以大晟名乐，时则有若周邦彦、曹组、辛次膺、万俟雅言，皆明于宫调，无相夺伦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词，虽道学如朱仲晦、真希元，亦能倚声中律吕，而姜夔审音尤精。^①

可知朱彝尊所推崇的姜夔词的雅，亦有“倚声中吕律”，“审音尤精”的特征。

“雅”作为文学范畴的第二个内涵是高雅。高雅是一种较高的文化本位，由于它要求审美接受者所达到艺术造诣、欣赏层次较高而不能为大多数接受者所认同，具有脱离下层的欣赏能力和欣赏习惯的特点，这正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对立。词本产生于民间，流行于胡夷里巷、勾栏瓦肆。无论内容意境、节奏韵味还是手法语言，都带有民间俗文学的特点。经过五代、北宋文人的改造，词体的俚俗色彩已淡去不少，但与诗相比仍雅俗判然。为提高词的品味，使词体雅化，姜夔做了积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白石于词中求雅从音乐开始。他以雅乐注入词体，一是以古乐府入词，二是以唐法曲音乐入词。使“清”、“雅”、“淡”的风格^②代替胡乐的秾艳急促，以古乐的雅音来革除“今曲”的淫靡。音乐的清雅为词替风格的清雅提供了基础。

浙西词派的词学家推尊姜夔的重要内涵即是学习其高雅的词品。与提倡高雅相联系，朱彝尊首先针对在清初甚为流行的《草堂诗余》迎合市俗口味的俚俗倾向提出批评，进而展示理想的高雅境界。他在《书绝妙好词后》中说：

词人之作，自《草堂诗余》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

《激楚》、《阳阿》和《巴人》之唱的比喻出自宋王《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阳阿》和《巴人》的差异正是高雅和低俗的区别。《草堂诗余》是坊间商人为了迎合宴集征歌之需而编选的，实为一种通俗唱本，所欣赏自然多为“巴人”无疑。朱彝尊倡高雅正是为了“解放”词体，使词这种文学形式重新回到雅文学的阵营中来。

四

明代是词学的衰微期，填词胜手既少，作品大多芜滥庸俗。朱彝尊激烈地批评明词：“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谐合。”^③指出明词的弊端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找到产生弊端的原因，然后投以药石，达到振衰起弊的效果。

朱彝尊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草堂诗余》。造成明词淫靡俚俗风气的原因很多，而《草堂诗余》在当时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尤为突出。《草堂诗余》是南宋中期“书坊编辑”的词选，在明代适宜的条件下极为流行。《草堂诗余》不仅影响了有明一代，对清初人也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草堂诗余》在清初是词人心中词体的典范、本色当行的代表。面对这样的词坛形势，以振兴词业、开一代词风为己任的朱彝尊就把扫荡《草堂》余风，扭转由明以来至清初的词风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朱彝尊、汪森编选《词综》给人展示词学新天地，意欲取《草堂》而代之；又努力推举南宋词选本《绝妙好词》、《乐府雅词》，进而彻底否定《草堂》，朱彝尊并结合自己的词学主张，对《草堂诗余》进行了全面的清算：

第一，朱彝尊对《草堂诗余》由于征歌需要而分类的形式予以抨击：

宋人词集大约无题，自《花庵》、《草堂》增入闺情、闺思、四时景等题，深为可憎。^④

《草堂诗余》是书坊选编，目的在于赢利，以市场需要为取舍标准，并不注重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分类编排，以便于宴会征歌取唱。吴昌绶对此评论：“惟其出坊肆人手，故命名不伦，所采亦多芜杂，取便

①《群雅集序》，载《曝书亭集》卷四十。

②法曲的音乐特点，参见《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隋炀帝厌其声淡。”

③《水村琴趣序》，载《曝书亭集》卷四十。

④《词综·发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时俗,流传浸广。”^①“取便时俗”四字可谓抓住了《草堂》编排形式的要害,朱彝尊对这种形式的否定,其实质是为了改变人们对词体的认识,恢复其文人雅士之艺术品的面貌。

第二,对《草堂诗余》的选目失当进行了批评,并大力推举姜夔、张炎一派,开拓了学习取法的门径。朱彝尊《词综·发凡》云:“《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又云:

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草堂诗余》不登其只字,见胡浩《立春》、《吉席》之作,蜜殊《咏桂》之章,亟收卷中,可谓无目者也。

朱彝尊批评《草堂诗余》多选俚俗而摒弃高雅之作,对《草堂诗余》选目的批评是与其推尊姜、张,鼓吹清雅的主张相联系的。

第三,斥《草堂》之俗,标举醇雅。《词综·发凡》说“(《草堂诗余》)流传耳目,庸陋取议。”《乐府雅词跋》云:“词以雅为尚,得是编,《草堂诗余》可废矣。”《书绝妙好词后》亦论及《绝妙好词》和《草堂诗余》之比较为“雅俗殊分”,均集矢于《草堂诗余》的庸俗。前文说过《乐府雅词》乃南宋曾慥选编,其宗旨以雅为尚,“涉谐谑则去之”。《绝妙好词》为南宋周密所选,选词范围限于南宋,陈匪石称此选乃“纯乎南宋之总集”,又说“周氏在宋末,与梦窗、碧山、玉田诸人皆以凄婉绵丽为主,成一大派别。此书即宗风所在,不合者不录。”^②《绝妙好词》既有南宋的时代性,又有风格流派的意义,与朱彝尊的词学宗尚相合,自然得到朱氏的推崇。《乐府雅词》和《绝妙好词》皆为体现选家求雅思想的词选本,与《草堂诗余》为侍筵应歌的市场俗众需求而选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朱彝尊将《绝妙好词》作为《草堂诗余》的对立物,崇雅斥俗褒贬分明。

客观地看,朱彝尊对《草堂诗余》的抨击,确有过于激切、苛刻之处,这是处于当时的词坛风气之中出于竖旗立派矫枉过正的需要。《草堂诗余》虽为书坊所编,但作为南宋的一个词选本,载录了相当数量的唐五代、两宋的词人词作,不少作品有赖《草堂诗余》方保存至今。《草堂诗余》出于应歌所需,思想性、艺术性或有欠缺,但从词体音乐性的角度来看,《草堂》所选,确有“本色当行”的特点。

为了消除《草堂诗余》的影响,朱彝尊特意选编了《词综》,意欲取而代之,改变词坛风气。《词综》26卷,汪森增补10卷,共计36卷。全书收录唐、五代、两宋、金、元词2253首,词人659人。《词综》是以明确的词学思想为指导的词选本,朱彝尊提出学习姜、张,倡导南宋,崇尚雅正,《词综》即体现了这种思想。陈廷焯云:“竹垞所选《词综》,……一以雅正为宗。”^③陈匪石亦说:“(《词综》)所录之词,自唐迄元,一以雅正为鹄。”^④词学指导思想的明确是《词综》得以取得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词综》以较大的篇幅收录南宋词人词作,如姜夔的词当时“仅存二十余阙也”^⑤,《词综》全部收入。另如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的词收入数量居于前列,此种特点与《草堂诗余》中南宋词较少、姜夔派词人词作遗缺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词综》以选本的形式表现了与《草堂诗余》截然相反的审美主张。《词综》的编成刊行,给习词者重新提供了范本,《草堂诗余》失去了市场。词人们跳出北宋婉丽之藩篱,尤为南宋姜、张一派所吸引,词坛风气开始发生变化。对此朱彝尊曾写下“从今不按、旧日《草堂》句”^⑥的词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汪森《词综序》言及词坛所尚由《草堂诗余》到《词综》的变化说:

世之论词者,惟《草堂》是规,白石、梅溪诸家,或未窥其集,辄高自矜诩。予尝病焉,顾未有以夺之也。友人朱子锡鬯,辑有唐以来迄于元人所为词,凡一十八卷。目曰《词综》……庶几一洗《草堂》之陋而倚声者知所宗矣。

朱彝尊力斥《草堂诗余》,选编《词综》对扭转清初词风起了重要的作用。龙榆生先生曾指出:“浙常二派出,而词学遂号中兴。风气转移,乃在一二选本之力。”^⑦《词综》即是转移词学风气的显例。《词综》

①《草堂诗余跋》,《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本。

②《声执》卷下,载《词话丛编》,第4958页。

③《词坛丛话》,载《词话丛编》,第3730页。

④《声执》卷下,《词话丛编》,第4962页。

⑤《词综·发凡》。

⑥《摸鱼儿》[同青士重访晋贤时书楼落成订《词综》付雕刻有怀周士秀青在吴兴],载《曝书亭集》卷二十六《江湖载酒集》。

⑦《选词标准论》,载《词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2号。

刊行之后，赢得了学词者的广泛欢迎，正如丁绍仪所说：“自竹垞太史《词综》出而各选皆废，各家选词亦未有善于《词综》者。”^①丁绍仪还把《词综》比作“倚声家”的“金科玉律”^②。吴衡照说：“词选本以竹垞《词综》为最善，吾乡许蒿庐先生为之评，凡夫抒情之妙，写景之工，以及起结过换衬贴之法，靡不指示详明，洵词坛广劫灯也。”^③“金科玉律”、“广劫灯”之称足见《词综》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崇高。事实上，《词综》成为了浙西词派理论的载体，对浙西派取得词坛盟主地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词综》之后，浙西派词学家亦十分注意用词选本来推扬词学主张。如王昶曾先后编成《明词综》、《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等，其“选词大旨，一如竹垞太史所云，故续刻于《词综》之后。”^④王昶之后又有黄燮清的《国朝词综续编》，选词宗旨一如朱彝尊和王昶。潘曾莹为其作序云：“其规式悉依竹垞、兰泉两先生选本。”^⑤由此可见《词综》的影响之深远。

除了其观点的鲜明、理论的系统、流派的推助之外，《词综》以治学的态度加以精心选编，《词综》本身的选择、编辑、校勘的高质量也是其为人推崇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朱彝尊是以治经史的态度和方法治词，以实际行动与词为“小道”、“卑体”的观念决裂。《词综》编选态度之严谨、认真在词学史上是空前的。汪森《词综序》说明了编纂《词综》的情况：“计览观宋、元词集一百七十家，传记、小说、地志共三百余家，历岁八稔，然后成书。”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详细列出了所引用书目及版本来源，举凡别集、总集，甚至稗官小说的名称无不详列，对词人姓氏爵里的考订也甚为认真，“考之正史，参以地志、传记、小说，以集归人，以字归名，得十之八九”。并对词的字句音韵做了考订，以求精当。

由《词综》的编校质量来看，郭麐所说的“《词综》一书，鉴别精审”^⑥诚非虚言。陈匪石说：“朱氏搜求佚书，不遗余力。凡明人未见之本，多经朱氏发见。例如专集之《山中白云》，总集之《绝妙好词》、《元草堂诗余》皆是。读其例言，凡所见之本及旁求而未获之本，一一罗列，后人按图索骥，藉以觅获久佚之籍，其功为多。”^⑦总体来看，《词综》编选者态度的端正认真，选目的取宏用精，文字校勘的细致审慎，都是前所未有的。朱彝尊以实际行动推尊词体，成为当时及后世钦佩的词学家。

从清廷入主至浙西派登上词坛的清初近40年，是词史上一个繁荣时期，在创作上表现为词人词作流派众多；在理论批评上表现为词学著作（词话、词韵、词律）、词籍序跋、词选本大量行世。然而细加考察，此时无论是词的题材内容、风格特点还是思想观念、理论主张都深受明代词坛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明词的延续，尚未自立旗帜，自辟领土。后人评云“清初沿习朱明，未离《花》、《草》”^⑧，“清初词派，承明末余波”^⑨，正是此谓。这种局面自从朱彝尊及浙西词派占据词坛要津之时得到了根本的转变。

朱彝尊不仅是浙西词派的领袖，而且是开一代风气的巨匠。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词学新见，并构筑了词学批评理论的系统。朱彝尊的词学理论批评具有反拨明代词学观念主张的性质，有极强的针对性；换言之，朱彝尊的词学主张指出了一条与明人几乎完全不同的道路。从朱彝尊及浙西词派之后，清代词学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与明代词风有了本质的区别，开始具有自己的特质，并不断强化之，终于成就了所谓“中兴”的宏业。

●作者简介：孙克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基金项目：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课题（AS1008）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三，载《词话丛编》，第2734页。

②《听秋声馆词话》卷十四，载《词话丛编》，第2759页。

③《莲子居词话》卷三，载《词话丛编》，第2453页。

④《国朝词综序》。

⑤《国朝词综续编序》。

⑥《灵芬馆词话》卷一，载《词话丛编》，第1503页。

⑦《声执》卷下，载《词话丛编》，第4963页。

⑧王煜：《自序》，载《清十一名家词钞》，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

⑨叶恭綽：《广篋中词》卷一，1935年番禺叶氏《遐庵丛书》本。